

百家论丛

[俄] И. Е. 切尔卡斯基 著
宋绍香 译



艾青：太阳的使者

AIQING:TAIYANG DE SHIZH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泰安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艾青：太阳的使者

[俄] Л·Е·切尔卡斯基 著
宋绍香 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青：太阳的使者 / (俄) 切尔卡斯基；宋绍香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1
(百家论丛)
ISBN 7-5034-1728-5

I. 艾... II. ①切... ②宋... III. 艾青 (1910~1996)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5321 号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
АЙ ЦИН - ПОДДАННЫЙ СОЛНЦ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3

根据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 1993 年俄文版翻译并得到了作者夫人、版权继承者涅莉·切尔卡斯卡娅女士的许可和支持。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孟祥成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荣玉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1500

装 订：北京荣玉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150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0.875 字数：235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车连义及其中国现代诗歌翻译与研究

——《艾青：太阳的使者》汉译本序一

[俄] Б. 李福清

正当《艾青：太阳的使者》汉译本即将出版之时，我的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的好友车连义的精心之作就要和友好的中国读者见面了，难过的是他已经看不到了，几年前（2003年）他就在以色列与世长辞了……

缅怀亡友车连义，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他生前的一些往事，犹如过电影一般，都一一出现在了眼前。

车连义是著名俄国汉学家 Л. 切尔卡斯基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 的汉语名字。他生前使用的图章就是刻的“车连义”三个汉字。1965年，我有幸与他一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当时来北京（北大，人大，外语学院）进修的苏联留学生共21人，因我是留学生班长，需亲自跑北京市公安局为同学们办理居留手续。申报材料上交一周后，我来到市公安局领居留证，其余20人的居留证都很顺利地拿到了手，唯独切尔卡斯基的居留证就是不给。当时我很着急，便问为什么？办事人员回答说：“他填写的是车连义，不是切尔卡斯基。名字对不起来，不予发证。”我便耐心地解释说：车连义是切尔卡斯基的汉语名字，车连义就是切尔卡斯基，很多外国汉学家都有汉名，如世界知名的瑞典大汉学家 Bernhard Karlgren 的汉语名字是高本汉。高是他的姓的音译，本汉是他的名字的音译。车连义这一汉名也是

如此：车是他的姓的简称，他的小名 Lenja 汉音就是“连义”。公安局的同志说那可以。（我很惊讶，他竟理解了我的解释！）

车连义是知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激情而幽默的诗人。1925 年，他生于俄国的一个医生之家。他的父亲是眼科大夫，母亲是流行病学专家。中学毕业后，他应当去当兵（二战尚未结束），但因视力不好，被分配到了军医学校。毕业后，他干上了副军医。所以，后来朋友们戏称他为“红（红军）产科军医”。他的工作是在一个炮兵营里担任副军医，但是，他很想到高等学校继续学习。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后来，他的母亲就托人把他调到了莫斯科军事翻译学院，学习汉语。当时的莫斯科军译学院是一所非常好的外语大学，有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研究中国唐诗的艾德林（Л. З. Эйдин）教授就在此任教。另外，汉学大师、苏联汉学创始人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有时也专门从列宁格勒赶来为学生们讲学。所以，这所大学不是一般的外语大学，而是俄苏汉学的一个重镇，有不少著名俄苏汉学家都是毕业于这所大学的。

毕业后，车连义被分配到苏军西伯利亚赤塔城司令部工作。但是，他的工作与他所学汉语无关，所学非所用；而他的理想则是利用自己所学的汉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于是，他考虑再三后，便下决心提出了退伍申请。退伍后，车连义便来到莫斯科，开始了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生活。按照他的汉语和文学水平，应该说，他在当时的《火星》和《文学报》等文学期刊上发表翻译作品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当时在莫斯科要找一个固定工作那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在找工作中，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看他的面容和他填的表，往往冷冷地说：“对不起，没有空位。”好几年他都没找到工作，只好靠菲薄的翻译稿酬度日。

车连义最早发表的翻译作品是 1954 年在西伯利亚赤塔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国 16 诗人诗选》。在这部中国 16 诗人的诗集中，选译最多的是田间的诗（15 首），艾青的诗也选了 3 首。当时，车连义除翻译中国现代诗歌外，还翻译中国现代小说。1955 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编译的《张天翼小说选》。这部译著后来曾多次再版，但他专心致志的主要还是中国新诗的翻译。

1957 年，他的老师、著名汉学家 M. 奥沙宁（M. Ошанин）教授主编一部《汉俄大词典》。他向东方研究所推荐了车连义，希望他也能参与《词典》的编纂工作。但是，没有被批准。后来，新成立的中国学研究所招考研究生，车连义顺利地考取了。他的导师艾德林教授分给他一个课题——《曹植诗歌研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他需要很好地提高古汉语水平。当时在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华侨叫杜日新，山东人氏，他虽没进过大学，却是自学成才，古文水平很高，人品也好，他帮助车连义等人阅读文言作品，车连义的古汉语水平提高很快。（杜先生 80 岁生日时，车连义还写了首古体诗献给了杜老。）

车连义用 3 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副博士论文，同时还翻译了曹植的许多诗歌，结集为《七哀》，由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于 1962 年出版。论文答辩后，车连义被留在中国学研究所任初级研究员。后来，中国学研究所与东方研究所合并后，他又成为东方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的研究兴趣，一直不是古典诗歌，而是中国现代诗歌。

1964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车连义翻译的五四时期的诗选，书名为《红潮》。书中选译了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瞿秋白、蒋光慈、殷夫等 9 位诗人的 68 首诗。他还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第一次向俄罗斯读者

介绍了五四诗人及其诗歌创作。

一年后（1965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编译的中国20~30年代的抒情诗选，以戴望舒的一首诗《雨巷》的题名为书名。其中选译了刘半农、朱自清、徐玉诺、谢冰心、徐志摩、朱湘、陈梦家、殷夫、蒋光慈、戴望舒、蒲风、王亚平等16位诗人的161首诗。

后来，车连义继续翻译中国现代诗歌。1978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20~40年代的中国40位诗人的诗选，题名为《中国40诗人诗选》。该诗集主要是新译的诗作，但也编入了部分过去的译作；1965年出版的诗集只选入了16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而现在这个《选集》则选译了40位诗人的作品，增加了徐玉诺、谢冰心、王统照、郑振铎、瞿秋白、郭沫若、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袁水拍、沙鸥、李季、柯仲平、梁宗岱、宗白华、康白情、徐志摩、朱湘、邵洵美、陈梦家、冯至、戴望舒、蒲风、王亚平、温流、萧三、艾青、田间、任钧等诗人的诗作。本书共印了1万册，但很快便销售一空。可以说，当时出版的《诗集》很少有这么大印数的，这说明他的译作在当时很有市场。车连义的译作搞得非常认真，非常精致，书末附有资料索引，注明了所选诗歌的出处。该集选译的最早的诗是汪静之先生1922年出版的《蕙的风》，最晚的诗是蒲风1937年出版的《摇篮歌》，只有殷夫与蒋光慈二位革命诗人的诗是从50年代出版的他们的《诗文选》中选译的，其他都是从20~30年代出版的诗歌中选译的。本书所选艾青的诗歌比其第一部译诗集（1954）多，共选译了13首。

车连义不只翻译现代诗歌，而且还注意研究这些诗歌。他每次出版译诗集，总要写一篇很长的序言，实际上是一篇很长的研究论文，向俄国读者介绍他们未知的中国现代诗人及其诗歌。

70年代，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文学丛书》，建立了《丛书》编委会，切尔卡斯基被列为编委之一。因为这部丛书要编选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诗歌，这非车连义莫属。该诗集以徐志摩的一首诗《为要寻一颗明星》题名为书名，所选诗歌从黄遵宪开始，包括秋瑾、苏曼殊及20~40年代诗人共38位中国近现代诗人的作品。当然该诗集不全是车连义自己翻译的，著名汉学家亚洛斯拉采夫也参与了翻译，还有一些“从逐字逐句的译文而变成诗”的苏联诗人也参与了翻译，但车连义亲自翻译的诗总得超过一半。如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徐玉诺、汪静之、徐志摩、朱湘、应修人、潘漠华、瞿秋白、蒋光慈、邵洵美、陈梦家、蒲风、王亚平、任钧等诗人的诗都是他个人翻译的。这本书印了25000册，对于印行《诗集》来说，这个印数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我每次都谈到印数，因为印数多，表明读者对他翻译的中国现代诗歌感兴趣，说明他的翻译水平高。

“文革”后，苏中刚刚开始恢复文化关系，1983年莫斯科“虹”出版社便出版了车连义编译的50~80年代中国诗选，书名为《蜀道难》。书中55位中国诗人的112首诗都是他自己翻译的。本诗集分两部：第一部是50年代的诗；第二部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书中也出现了过去他未曾翻译的诗人（或作家），如叶圣陶、顾工、公刘、蓝曼、李瑛、王尔碑、浪波、李发模、韩瀚等，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后的诗人。当然，其中也选译了艾青50年代写的5首诗（其中有旅美诗）和“文革”后写的5首诗。本诗集所选诗歌除现当代诗歌外，还选译了部分汉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歌和谜语（9则）。像他的其他译著一样，这次印数也不少，又印了10000册。

车连义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1989年，莫斯科“虹”出版

社又出版了他编译的艾青诗选——以艾青的一首名诗《太阳的话》命名。《太阳的话》俄文版诗集共选译艾青诗 121 首，分为三部：第一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 1932 ~ 1949 年的作品；第二部《向世界》，包括 1949 ~ 1957 年的作品；第三部《生命和时间》，包括 1977 ~ 1980 年的作品。车连义还专门写了一篇非常精致的长篇序言，重点论述了艾青的创作道路、艾青的诗论及其坎坷的人生经历。这本书是车连义献给艾青 80 岁诞辰的一份厚礼。

车连义虽然翻译了许多中国现代诗歌，但是，翻译决不是他的最终目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所以，他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就努力向自己的导师——中国权威诗评家谢冕教授学习诗歌理论。他怕谢教授听不清他说的汉语，每次都大声讲话，几乎使全楼的人都能听到。

那时我每周都去城里申书店，特别去琉璃厂与东安市场，一看到旧诗集就给车连义买。晚上回到宿舍上楼就大声喊：“车连义快出来！”他一听就明白是有书给他，便兴高采烈地迎出门。他有时也去书店，但收获不大。他主要是在图书馆看书。那时他在北京确实搜集了不少资料，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他还嫌资料不够，还要专门乘车到列宁格勒彼特罗夫家中去查找。彼特罗夫是我的老师，在列宁格勒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了不起的汉学家，既通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通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格律。1958 ~ 1959 年他在北大进修时，什么都不买，就是买书，特别买 20 ~ 40 年代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买了很多很多。后来巴金曾说，他的作品在彼特罗夫家中最多，有的书他在抗战时期丢了，但在彼特罗夫家中能找到。可见彼特罗夫先生藏书之多。另外，彼特罗夫先生还注意拜访中国作家，请他们每人写一份小“自传”，已故作家，就请他们家人代写。

所以，他对中国作家的资料了如指掌。60年代，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约我撰写康濯词条，当时还没有中国现代作家词典，仅有一本日本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事典》，上面虽然有康濯词条，但注明“生年不详”。无奈，只好给彼特罗夫老师写信，一周后便得到了回答：“康濯生于1920年”；还有一例，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汉学家谈起某创造社成员在《创造》期刊发表作品时，彼特罗夫马上指出，此人不是创造社成员，他在《创造》杂志发表文章是因为他是主编的邻居，他们同住上海某街某号某楼，门对门。彼老对中国作家的熟悉使大家吃惊！他在1954年就出版了第一本《艾青评传》；说它是“第一本”，就是说，它不仅是苏联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书，同时，它也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本《艾青评传》，具有开拓性意义。彼特罗夫家的藏书斋叫“苏洵书屋”——因他的导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研究苏洵，而他本人也喜欢苏洵的《六经论》而得名。所有中文书都藏在“苏洵书屋”。其中，艾青的作品占两“肘”（过去的长度单位，即自肘至中指末端，约半公尺），臧克家的两肘，田间、王亚平、汪静之的各一肘，朱湘与卞之琳的各半肘。真不知道世界上能有哪一个图书馆藏那么多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所以，车连义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彼特罗夫家。

车连义住在列宁格勒宾馆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彼特罗夫家的“苏洵书屋”里看书。一连几天，似乎也感动了彼老，平时他只准在此阅读，不准将书带出书屋，然而，这次却给了车连义一个“例外”，允许他将书带回宾馆去看。后来也允许把一些书带到莫斯科。其他人（包括笔者）不行。就这样，在彼老的帮助下，车连义写出了一篇资料翔实而丰富的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诗歌研究》。

1971年5月，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召开车连义博士论文

答辩会，正式评审教授是：汉语学家戈列罗夫教授、晚清小说研究专家谢曼多夫博士、鲁迅研究专家波兹诺耶娃教授。按规定，评审前参评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论文并写出简短意见书。意见表明：大家都认为这篇博士论文写得很好，可以答辩。但是，答辩前两天，莫斯科大学波兹诺耶娃教授却提出，她决定不参评了，因为她不同意车连义博士论文的观点。车连义连忙跑到我家请我当正式评审教授。我花了一昼夜时间才阅读完了他的七百多页的打字稿。我认为论文写得很好，并写了简短的评论书。答辩这天，我很早就来到会场，告诉学术秘书我已作好了准备。但我发现波兹诺耶娃教授也来了。我问她：“你不是不参评了吗？”她答：“我不当正式评审教授，但自由发言时我可发表意见。”答辩会上，三位正式评审教授都一一作了发言，大家一致称赞车连义的论文写得好，很有学术价值。三位正式评审教授发言后，波兹诺耶娃也起来发言，她认为这篇论文不行，因为车连义研究的许多现代诗人政治上有问题，是托派分子，如某诗人30年代在上海酒店里同其他作家会见时讲了许多错话等等。她谈了许多，但都是“政治问题”，关于车连义的诗歌研究，却一句也没讲。她讲完后，中国老革命家、中共老党员、历史学博士郭绍棠起来发言，他批驳了波教授的言论，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同时，他对车连义那么深刻地理解中国诗人的心理和中国人的心，表示惊叹！最后表决：学术委员会30人，其中28人投票同意，只有两人投票反对。车连义的博士论文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但是，波兹诺耶娃仍不服气，还向党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最高仲裁委员会反映了她的意见，但最后仲裁委员会还是批准了车连义的博士学位。车连义的这篇学位论文虽遭遇了不少周折，但学位通过后不久，就由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上面主要介绍了车连义的诗歌翻译，下面重点谈一下他的学

术研究。

车连义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1963年出版的《曹植诗歌研究》。这部著作是在其副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深化而完成的。它专题论述了曹植时代、建安七子、建安风骨、曹植生平及其诗歌；尤其对其《洛神赋》及其诗歌中的典故都作了精心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最后一章深入探讨了曹植诗歌与乐府民歌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曹植的一部书，第一次向我国读者和学界介绍了这位伟大的诗人及建安文学。

他的第二部学术专著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20~30年代的新诗》，东方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这部500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中国20~30年代的诗人及其作品，很有学术价值。全书共分两部：《五四时期的诗歌》与《现实派与颓废派》。第一部设8章，主要论述和分析了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各种文学争论、白话诗的胜利、胡适的《尝试集》以及五四运动对新诗创作的影响。同时，还阐释了新诗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包括翻译、模仿、借用西方形象，中国诗人如何歌颂西方伟人、如何描写西方问题等）和五四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以下的《现实派》专章中，重点论述了“文学研究会”及刘大白、徐玉诺、谢冰心、汪静之的诗；在《浪漫派》专章中，重点分析了郭沫若的《女神》、王独清的《长安》和朱自清的长诗《毁灭》。

我以为写得更有用的是第7章《中国自由诗》。著者深入分析了中国自由诗的特征，独特地指出了自由诗的诗句与诗节、韵脚与韵律、无韵诗与散文诗的特点。第8章还专门分析了小诗（短诗）。著者将中国小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作了比较，也与日本的俳句（又名发句）和短歌，与印度泰戈尔的短诗作了比较，还探讨了外国诗的影响等问题。

第二部《现实派与颓废派》设6章。著者在这一部里精细地分析研究了各种诗歌流派的诗人与创作，如对象征派，则研究了李金发、穆木天及“现代社”诗人的作品；同时，也研究了“新月社”诗人的创作及其刊物《诗刊》；另外，对闻一多新格律诗诗句的长短、韵脚的位置以及对中国缀韵十四行诗都有独到而精深的研究。

车连义在这部著作中还特别关注1932年左联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对他们提出的口号，诗人的创作状况和创作风格都一一作了缕析，对其会员杨骚、穆木天，尤其蒲风的诗作了重点分析，最后一章专题研究了蒲风的长诗《六月流火》和田间早期的自由体长诗《中国农村底故事》。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如此详尽地介绍车连义的这部书，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介绍性的书，而是倾其毕生精力对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学术成果；它是最早运用世界文艺学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诗人创作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开拓性之作。很遗憾，中国社科院的李聘先生早就翻译了该著，而且还让车兄看过译稿，但至今未得出版。

继《中国20~30年代的新诗》后，车连义又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中国战争年代的诗歌（1937~1949）》（东方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该著主要是对抗战时期的诗歌研究。为了完成这部著作，车连义先后阅读了近二百部诗集，还不包括集体出版物（合集）和期刊中发表的诗歌作品。所以，著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分析了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6~1949）时期的中国诗歌，分析了其形式、风格、结构和艺术形象之审美；彻底研究了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同世界进步的首先是俄国和苏联的诗歌的关系；设专章对当时最著名的中国诗人尤其是艾青、臧克家、柯仲平、萧三、袁水拍、李季、沙鸥等

的创作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著者不仅探索这一时期诗歌本身及其创造者精神文明的积极意义，探索主题思想的新颖，将诗歌变成有效的思想斗争的武器，而且还探讨诗歌形式的创新、推广和普及，还设专章研究诗歌中的形象（性质形容词、借喻、譬喻、夸张、比喻、隐喻等），研究当时诗歌中常用的“火”、“血”、“旗”、“心”、“土”形象。最后一章论述了服务于群众的现实艺术，特别评析和称颂了艾青的长诗。该著可以说是上部著作的续集。

车连义在完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后，又独辟蹊径，推出了有关文化交流的著述《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东方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虽然，这似乎不是什么新的课题，在此之前也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但那仅仅是些零零碎碎的小文章，全面系统的研究著述还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车连义的这部书又具开创性。该著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诗人如何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中国文艺界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看法和争论以及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等。同时，也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了中国诗人艾青、胡风、戈壁舟、邹荻帆、李季等献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以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著者很认真、具体地分析了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汉译问题。众所周知，马雅可夫斯基的语言很独特，格律也是全新的，用汉语翻译起来非常困难，因此错译之处在所难免。车连义把这些误译归纳为如下几类：曲解原意（деформация смысла），忽视前置词（ускользающие предлоги），形象毁坏（разрушение образа），同音词变异（метаморфозы омонимов），成语错位（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 теряют лицо）。著者举出了这样的例子，如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的“рот”一词，本是“рота”（连队的连）的复数二格，译者却译成“喉咙”（рот——嘴，口腔）；再如“ложи”，本是“ложа”

（剧院中的包厢）的复数，译者却译成“撒谎”（ложь）等等。

车连义将自己的研究课题扩而大之，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在东方”的研究格局。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他又推出了一部新的学术力作《俄罗斯文学在东方：翻译理论与实践》（东方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车连义利用自己汉语翻译的实践、知识和理论，在同行的帮助下借助日文及其他东方语言翻译的实践和经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他研究了东方国家的一些文学家是怎样改写俄罗斯文学作品，怎样把俄罗斯文化背景改为自己国家文化背景；也研究了他们怎样将俄罗斯小说改编成剧本等。从而，提出了制约文学翻译的文学传统与翻译心理、原文形象与民族传统诸多译学的理论问题。为国际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除了学术专著之外车连义还写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因篇幅有限，只好割爱，不再赘述。

车连义是一个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勤奋治学的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感情丰富、幽默的性情之人。譬如，他非常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学，尤其热爱中国现当代诗歌，所以很想接触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很想到中国来。然而，过去（苏联时期）由于不可名状的原因，每每使他不能“如愿”：每次，中国大使馆邀请苏联汉学家、文化工作者观看中国影片时，其他汉学家都可以去，所里外事局唯独把车连义的请帖扣住不给他，故意不让他去；50~60年代中苏两国教育部和科学院有协议，双方可互派留学生、进修生，然而，车连义的出国进修的申请却迟迟不批；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但是，每次作家访华代表团里都没有他。这一切不顺心的事，常常使他苦恼和激动。不过，车连义还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幽默诗人。一般来说，幽默的人往往会说幽默话和笑话，然而，车连义不同，我从来没听

到过他讲笑话，他是写幽默诗。每次朋友的生日或朋友聚会时，他都每人赠一首幽默（打油）诗。翻译《西厢记》的著名汉学家孟列夫（缅什科夫）50岁诞辰时，车连义就赠给他一出幽默短剧《崔莺莺倾心孟列夫》：

张生（上场，白）：

我乃一个穷书生，爱上那相国千金，写剧的王实甫保证，此段姻缘结局圆满，莺莺必成小生夫人。

（唱）

哎呀！真是不幸，
哪里来了个孽种，
使手段轻而易举，
勾引了美人莺莺。

（纵身跳入湖中）

红娘（上场，白）：

真是麻烦！离成亲就剩两天了，可小姐还在寄书传情，死活也不嫁给张生，说心中另有他人！

（唱）

女儿心碎泪泉涌，
但愿嫁得孟郎君。

莺莺（踉跄上场，白）：

哎！红娘啊红娘，我心中憋闷，快与我松开衣带，也好透口气来。

红娘（白）：

阿弥陀佛，可怜的小姐，你俩肯定又在梦中见了面。

莺莺（白）：

提笔翻译王实甫，

一句即可见真情，
心有灵犀一点通，
奴家娇媚又迷人，
译笔生花不惜墨，
无不为我崔莺莺：
清纯美丽集一身，
自表心迹无他人，
称我国色能倾城，
张生你又有何能？

红娘（白）：

想那张生已不是从前的书生，现在做了通讯院士，说白了，就是当了翰林……

莺莺（唱）：

孟郎是个健谈人，
通宵达旦说变文，
君若有意谈三日，
莺莺奉陪求学问。

郑夫人（母亲，上场，白）：

老生听到风声，
莺莺倾心孟君，
你若嫁得此人，
除非月亮不升；
非因孟君不好，
实为时代不同。

（莺莺殉情自尽）

（阎国栋 译）